

嘉兴南湖红

■张偶良

山河赋

杭嘉湖平原腹地,镶嵌着一颗明珠——嘉兴南湖。这片湖水占地仅1.12平方千米,是中国人精神版图上的一处极为重要、鲜明的地标。

南湖的船,党的摇篮。105年前,红船的桨拨动水面,一个伟大政党在南湖启航。从此,中国革命翻开新篇章。2017年10月,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,习主席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,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。习主席深情地说:“上海党的一大会址、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。我们党从这里诞生,从这里出征,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。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。”

秀水泱泱,红船依旧;时代变迁,精神永恒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,让我们循着南湖记忆,去品味那片沉静湖面的气韵与风采,感悟历久弥新的伟大建党精神。

——编者

2026年夏日,我又一次满怀激情,来到嘉兴南湖。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红色横幅,在会景园入口处迎风舒展。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官兵列队走过湖滨栈道。我的目光投向湖心岛,投向那艘静静泊着的画舫。游船往来穿梭,导游的讲解声、孩子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。

105年前的那个夏天,同样的水波,同样的蝉鸣,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,就在这片水域,完成了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”。

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上,这片水域的分量,无可替代。

一

南湖的故事,要从后晋天福年间(公元936—944年)说起。彼时,广陵王钱元璩任中吴节度使,在嘉兴城之南、鸳鸯湖畔筑起楼台宾舍。这位钱氏子弟当时未曾想到,他的一次园林营造,竟为后世留下一方文化渊藪。

南湖儿女常说,水是有记忆的。南湖的水波里,荡漾着千年的文脉。北宋的苏东坡在此留下“出城三十里,得此烟雨奇”的诗句。元代画家吴镇绘下了《嘉禾八景图》,水墨氤氲中可见烟雨楼的轮廓。明代文人李日华在《南湖笔记》中详细记载了南湖的风物人情……这些诗词书画,赋予南湖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始建于五代,楼名取自杜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句。明嘉靖年间,嘉兴知县赵瀛疏浚城河,将淤泥堆积成岛,烟雨楼移建岛上,从此形成了“湖中有岛、岛中有湖”的独特格局。

1912年冬,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南下游历,专程来到嘉兴。他在各界人士陪同下登临烟雨楼,在楼前与欢迎群众合影留念。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中,孙中山先生身着深色大衣,神情坚毅而温和,身后是烟雨楼的飞檐翘角,身侧是嘉兴士绅和青年学生。那时,孙中山先生正为“实业救国”奔走呼号——规划铁路、振兴工业、发展民生。9年后,另一群年轻人在他留影的同一片湖水边,选择了另一条救国之路。

若问南湖让我感受最深的独特气质是什么,我会说:守正与创新。这两种特质,在南湖儿女的血脉中并存了千年。嘉兴地处吴根越角,自古是吴越文化的交汇处。这里的人不尚空谈,重实务,敢为天下先。明代,嘉兴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,项笃寿的“项氏万卷堂刻本”风行天下,所刻《全史论赞》《东观论》至今仍是古籍善本中的珍品。晚清,嘉兴人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,以出版开启民智。他主持编印的《四部丛刊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,为中国文化保存了火种。上世纪初,嘉兴籍教育家褚辅成、沈钧儒等锐意改革,培养了大量人才。这种敢开风气的精神,渗透在南湖的每一朵浪花里。

南湖文化中还有一股倔强的正气。近代以来,这种“守正”精神升华为民族大义——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,南湖儿女从未缺席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浙江陷入白色恐怖。嘉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,他们经常在南湖周边秘密活动。有一位名叫沈如凉



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。

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

老党员,常在夜间划小船在南湖上与其他党员、革命群众接头。他的儿子后来回忆:“父亲说,南湖的芦苇荡就是天然的掩护……”

嘉兴人有一句老话:“宁可湿衣,不可乱步。”意思是宁可淋湿衣裳,也不能乱了脚下的步伐。这股气韵,从烟雨楼的文人雅集延续到革命者的不屈信念,一脉相承。

南湖儿女骨子里守正与图新并存,既“敢为人先”,又“坚守正道”。这种精神气质,日后被那艘画舫上的会议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——“开天辟地是‘图新’,坚定理想是‘守正’,敢为人先是‘图新’,忠诚为民是‘守正’”。

二

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开幕。

会议并不顺利。7月30日晚,代表们正在开会时,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,建议马上终止会议,代表们迅速撤离。十几分钟后,会议地点就遭到法租界巡捕搜查。

会议地点已经暴露,必须紧急转移。下一步去哪里?众人争论不休。有人提议去杭州西湖,但西湖游人太多,目标太大;有人提议回上海租界另找地点,但风险同样不小。

这时,党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——一位出生于嘉兴乌镇的女性,轻声说出了铭刻于历史的建议:“我的家乡嘉兴有个南湖,湖上有游船,可以包一艘船在湖上开会,既安全又隐蔽。”

王会悟并非随口一说。她对南湖非常熟悉。她知道南湖水港交错、芦苇丛生,便于隐蔽;她知道南湖有租船游湖的风俗,不会引人注目;她知道从上海到嘉兴有沪杭铁路,半天可达。而且,她行事缜密、胆大心细——此前“一大”的会务安排和安保工作,就是由她一手操持。

8月初的一个上午,代表们分批抵达嘉兴。王会悟提前一天赶到,在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定下房间,又托旅馆账房先生租了一艘中型画舫。她还细心地准备了一幅麻将牌,放在船舱里——万一遇到盘查,代表们就以游客身份应对。

那天的画舫,外表与普通游船无异:雕花木窗,蓝印花布坐垫,一张八仙桌,几把太师椅。然而船舱里发生的对话,却震古烁今。会议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6点。王会悟坐在船头,撑着一把油纸伞,警觉地观察四周。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裤,看上去就像一位赏景的少女。每当有别的船只靠近,她就轻轻敲击船舷——船舱里的麻将声便会响起。有一回,一艘汽艇远远驶来,马达声由远及近,王会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但她没有慌乱,反而放声唱起了嘉兴民歌。汽艇从旁边驶过,原来是当地豪绅的游艇,虚惊一场。

下午6时左右,代表们压低声音喊出“第三国际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,王会悟在船头听到了,她的眼眶湿润了。

此后数十年,南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象征。1941年,中共中央规定7月1日作为党成立纪念日。1959年,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。那艘承载历史的画

舫被仿制陈列,命名为“南湖红船”。“红船精神”与“南湖”二字紧紧相连。

南湖还有很多红色记忆。1925年,中共嘉兴独立支部成立,这是浙江省早期党组织之一。抗日战争时期,南湖周边活跃着多支游击队。他们利用水网地形与日寇周旋,创造了不少水上游击战的成功战例。1949年5月,嘉兴解放,解放军进城的第一站就是南湖——部队在南湖边举行了解放仪式,红旗在烟雨楼前冉冉升起。

三

党从南湖出发,一直走到天安门城楼。南湖之水,汇入历史的大潮。

那是一条多么壮阔的航程啊。从南湖到井冈山——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里写下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,在黄洋界保卫战后吟出“敌军围困万千重,我自岿然不动”。

从井冈山到遵义——红军在湘江血战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,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但遵义会议的火盆温暖了整个党。

从遵义到延安——宝塔山下的窑洞里,毛泽东写下了《论持久战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延安的歌声唱出全民族的心声。从延安到西柏坡——党中央在太行山深处指挥了三大战役,电报喀嗒声中,一个旧时代正在崩塌。

从西柏坡到北平——毛泽东说“进京赶考”,绝不当李自成。

南湖的红船不大,却承载了最重的使命;南湖的水不深,却孕育了最深的信仰。新中国成立后,南湖迎来了新的命运。上世纪50年代,嘉兴人民开始系统治理南湖水质——经历战乱和多年失修,这片“母亲湖”已经淤积严重。数万军民肩挑手扛,清淤疏浚,重建堤岸。一位参与当年劳动的老船工回忆:“那时候没有机器,我们就用扁担挑,一担一担把淤泥挑出去。冬天湖上结冰,我们就砸开冰层继续干。大家说,这是党的诞生地,我们不能让它脏了。”

改革开放后,南湖的保护与开发进入新阶段。1985年,南湖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。1991年,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,馆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。

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将“红船精神”概括为“开天辟地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,坚定理想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,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”——这三个维度,源于南湖,又超越了南湖。

进入新时代,南湖的红色教育功能不断增强。每年“七一”,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来到南湖,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。今年是建党105周年,南湖之畔又迎来了新的气象:数字化展馆建成,及近,王会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但她没有慌乱,反而放声唱起了嘉兴民歌。汽艇从旁边驶过,原来是当地豪绅的游艇,虚惊一场。

下午6时左右,代表们压低声音喊出“第三国际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,王会悟在船头听到了,她的眼眶湿润了。此后数十年,南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象征。1941年,中共中央规定7月1日作为党成立纪念日。1959年,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。那艘承载历史的画

舫被仿制陈列,命名为“南湖红船”。“红船精神”与“南湖”二字紧紧相连。南湖诗歌节”“红船艺术节”等活动蓬勃开展,千年文脉与红色基因交相辉映。

最动人的,是那些普通人身上的“南湖印记”。我在南湖畔遇到一位姓张的退休教师,73岁,精神矍铄。他每周义务为游客讲解南湖历史,风雨无阻,已经坚持了12年。我问他为什么坚持,他说:“我父亲当年参加过清淤,我教了一辈子书,退休了就想让更多人知道这片水有多少故事。讲南湖的故事,讲我们党的故事,越讲越精神。”这次,我还碰见一位嘉兴籍年轻女兵。她在休假期间来南湖“充电”,在红船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她说:“每次想家、每次遇到困难,我就想想南湖,想想当初那些人的勇气。”

四

夕阳西下,我在风景如画的沿湖绿道环走一圈后,再次回到会景园。晚霞把湖面染成金红,红船静静地泊在湖心岛边,像一枚小小的船形勋章,别在大地胸前。我忽然想起董必武1964年重访南湖时写下的那首七绝——

“革命声传画舫中,诞生共党庆工农。重来正值清明节,烟雨迷濛访旧踪。”董必武当时已是78岁的老人。他站在南湖边,是不是想起了43年前那个夏天,想起了船头的王会悟,想起了船舱里的争论,想起了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——何叔衡、邓恩铭、陈潭秋……

而今已是仲夏,没有烟雨,只有满湖的金光。那个曾经在船头望风的年轻女性,那些在船舱里激烈讨论的年轻代表,他们如果看到今天的南湖——游人如织、波光粼粼,湖边的孩子用手机拍摄红船,年轻军人列队向党旗宣誓,白发苍苍的老党员热泪盈眶地重温誓词——他们会作何感想?

我想,他们会欣慰。因为他们当年选择的道路,今天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。他们播下的火种,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燃成了不可熄灭的火焰。

南湖还是那个南湖,千年如一日地荡漾着。但南湖又不是那个南湖了——它承载的记忆、凝聚的精神、指向的未来,早已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水域。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,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见证者,是赓续初心、永向前行的精神坐标。

水有源,故其流不穷;木有根,故其生不穷。南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“源”和“根”。从这里出发,便不会迷失方向;在这里回望,便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。

夜幕降临,南湖灯光次第亮起。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被勾勒出金色轮廓,倒映在水中,水波荡漾,光影交融,像一座漂浮的宫殿。那艘红船依旧静静泊着,灯火映照下,船身的轮廓清晰而庄严,仿佛一直在注视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本版学术支持:褚 银



《曙光映南湖》
扫码观看视频

我驻守的地方

受领机动驻防任务后,我们千里机动、穿越戈壁雪域,奔赴边境一线营区。这里地处喀喇昆仑山与冈底斯山交会腹地,两岸雪峰对峙、险峰壁立,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。驻地长冬漫漫,寒季长达8个月,昼夜温差超30摄氏度,方圆百里人迹罕至。营区生活物资、饮水副食全依靠后方车辆转运。每到春夏融雪期,山洪、泥石流频发,道路时常中断,艰苦环境时刻考验着每一名戍边官兵。

我至今难忘那次带队巡逻的情景。那天,流云缠绕在喀喇昆仑山脊,与皑皑冰雪相融。我和战友全副武装,沿着崎岖山路行进。一名战士突然说:“快看那块岩石,像极了国旗!”

众人驻足,循声抬眼望去,只见一方巨岩屹立于山腰崖壁之上。岩体呈赭红色,整体轮廓方正,正如一面迎风舒展的国旗,在连绵雪峰的映衬下,分外庄严肃穆。排长王鹏远上前反复步量比对,岩石长宽比例匀称,与国旗形制高度契合。

巡逻归队后,连队党支部达成共识,依托这块天然岩石彩绘国旗,打造属于我们边防官兵的精神地标。提议一经提出,全连官兵纷纷响应。

待天气转好,我们就立刻携带工具登上崖壁。高原寒风凛冽,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生痛,高寒缺氧让抬手落笔都倍感吃力。大家分工配合,仔细清理岩面积雪浮尘,调配颜料,凝神聚力勾勒轮廓,填涂色彩。

岩壁粗糙坚硬,长时间抬臂作业,大家手臂都有些酸胀发麻。岩石孔隙吸水性很强,颜料必须涂得很厚,才能显现出国旗应有的颜色。整整3天,官兵早出晚归、往返奔波,一遍又一遍叠加上色,直至岩面上的国旗色彩鲜亮、色泽稳固。一面规整鲜亮的国旗终于完整呈现在崖壁之上。雪域群山之间,这一抹鲜红熠熠生辉,官兵亲切地将此处命名为“国旗山”。

自此,国旗山便成为我们边关一道

国旗山

■李小龙

特殊的风景。每次巡逻队伍途经此处,官兵都会自发驻足,面向崖壁上的国旗庄严敬礼。这一简短仪式,是官兵无声的誓言。纵使风雪肆虐、山路艰险,只要望见这面“国旗”,大家心中便斗志昂扬、步履坚定。

这里成为连队各类团日活动、新党员入党宣誓的场地。“七一”等重要时节,全连官兵会集结上山,为国旗山描红补色,让崖壁上的国旗一直鲜红如初。

寒来暑往,岁月流转,国旗山静静屹立,日夜陪伴着坚守战位的戍边官兵。它早已不是一块普通山岩,而是与我们朝夕相伴的亲密战友,是扎根雪域、铸魂砺志的精神灯塔。这抹永不褪色的红,见证着官兵扎根高原、矢志戍边的忠诚坚守,也始终引领着我们坚定守护祖国大好山河。

仰望困牛山

■胡启涌

红色足迹

崇山峻岭中的困牛山,位于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川岩坝。92年前,100多名红军战士在此壮烈牺牲。

站在远处眺望,树木覆盖的困牛山像一头健硕的巨牛,横卧在大山间。终年流淌的黑滩河从山底流过,淙淙流水声,给大山添了几许深邃。困牛山的临河面是刀削般的峭壁,岩石狰狞,让人生畏。1934年10月16日,红6军团第18师第52团的多名红军战士,就是在这里纵身跳崖,血染虎井沟。年轻的生命,滚烫的鲜血,坚定的信仰……今天,我站在虎井沟底,望着高高的悬崖,思绪久久难以平复。

1934年8月7日,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红6军团9700余人,从江西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出发。10月7日,红6军团进入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与敌遭遇。红军杀出重围后,国民党军又聚集24个团进行追堵。危急时刻,担任后卫的红18师第52团奉命改为前卫,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,掩护主力部队转入黔东与红3军会合。

10月16日,红52团放弃追随主力部队,改道向西,将追兵而来的国民党军成功引入困牛山。400多名红军官兵在困牛山的鼎罐堡进行绝地阻击,击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。16日中午,18师师长龙云率200余人突围,往困牛山西南老君山方向追赶主力部队。红52团团长田海清率100多名红军战士固守鼎罐堡,继续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厮杀。激战中,团长田海清不幸牺牲。面对英勇的红军队伍,无计可施的国民党军抓来当地百姓,胁迫他们走在前面,一步步向红军阵地逼近。为了不伤及百姓,红军战士只好被迫“冲锋十余次,全用肉搏”(《任弼时年谱》)。最后,战士们抱着“宁死不当俘虏,宁死不伤百姓”的信念,砸毁枪膛后,毅然跳下了数十米深的悬崖……

困牛山战斗结束后,当地百姓利用夜色掩护,来到虎井沟收殓红军遗体,在沟边的树林中,用石头垒起坟冢。后来,每年清明节,人们都会带上菜肴酒水,来到虎井沟祭奠红军烈士。村干部张国玉指着沟边黑黑的石壁说:“那石壁就是当地百姓多年烧纸熏黑的。”她



还告诉我,她家住在老君山上,困牛山战斗打响那天,她的爷爷张朝贵正在山上放牛,看得清清楚楚。

时光如水,困牛山已不再是当年贫瘠的模样。一条宽敞的公路顺山而上,路边是一栋栋漂亮的楼房,很多楼房的墙面上都画有“红军激战困牛山”的主题画。这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,是刻在骨子里的军民鱼水情。

困牛山上松涛阵阵,苍翠如墨,团长田海清和战友们,就安息在静谧的松林间。

我手执一枝带露的白菊,往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走去。形如火炬的纪念碑矗立山间,上面竖刻着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”的红色大字。碑座正面上端,萧克将军题写的“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”10个大字,苍劲有力。纪念碑后面的烈士墓,一座挨着一座。肃立先烈墓前,我似乎还能依稀听到嘹亮的军号声,在大山里响起。

困牛山红军学校的校门不远处。站在冲锋号造型的校门前,校长告诉我,校门的设计源自一个真实故事。当年,红军在困牛山跳崖后,司号员何少荣被半山的藤蔓缠住;夜里醒来,他将军号藏在虎井沟的一个山洞里,独自走出山沟。后来他昏倒路边,被当地的陈氏夫妇救活,改名陈世荣。他把军号取回后,打磨得铜光闪闪,珍藏在家中。晚年,陈世荣会拿上军号,到学校给师生讲红军的故事,讲到动情处还吹起冲锋号。2001年,老红军陈世荣去世。学校在修建校门时,决定把校门设计成军号状。这既是对老红军的怀念,也是向困牛山牺牲烈士们致敬。

困牛山海拔并不高,但它顶立天地,直冲霄汉,让后人心生敬仰。

上图: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。

资料图片